

青少年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

刘 珊 石人炳

摘要: 基于来自湖南、广东、广西、上海、甘肃、浙江、福建、江苏 8 省市 2000 多名中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亲社会行为状况及其内部结构、道德推脱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较低;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地反向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即道德推脱程度越高,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不同维度的亲社会行为。

关键词: 道德推脱 亲社会 青少年 问卷调查

近年来,各种不道德事件不断发生。这促使人们思考,人为什么会做坏事?做了坏事后又如何摆脱内疚和自责?班杜拉(Bandura,1986)提出过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的概念,试图以此解释这一潜在的心理过程。道德推脱是指通过分离个体行为与其内在的道德标准,从而使行为主体避免因违反道德标准而进行自我制裁。道德推脱属于道德心理层面的问题,道德心理影响道德行为。有关道德推脱影响道德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道德推脱与反社会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二是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

有关道德推脱与反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涉及不同群体和领域。对台湾某大学 462 名运动员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会调和控制点与规则违反行为的关系;具有外部控制点的运动员可以接受更多教育,通过更少的规则过犯行为和更多的道德承诺来提高体育竞赛和比赛的质量(Tsai et al., 2014)。对企业家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经济回报动机和道德推脱正相关,道德推脱和不道德决定正相关(Baron et al., 2015)。有研究对 1022 名来自悉尼、澳大利亚 10 所私立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高道德推脱和低自律性可以独立预测曾经的酒精行为(Teesson, 2012)。

大量文献证实了道德推脱和年长的孩子、成年人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利用班杜拉等(Bandura et al., 1996)编制的“道德推脱量表”(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有研究证明了道德推脱与反社会行为的强相关(Osofsky et al., 2005)。对 147 名意大利工人的调查也显示,道德推脱和组织中个人适得其反的职场行为以及组织整体适得其反的职场行为正相关(Fida et al., 2015)。一些研究还证实了道德推脱和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关系(Bandura et al., 1996; Pelton, 2004)。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道德推脱在青春期相对稳定,但是从 14 岁到 20 岁开始下降;在控制性别和早期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道德推脱可以预测现在和将来的反社会行为(Paciello et al., 2017)。因而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不论成年人还是小孩,道德推脱始终显著影响反社会行为。

关于道德推脱已有大量研究,但大多集中于道德推脱影响不道德行为,对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杨继平、王兴超(2015)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会抑制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道德推脱与员工行为的相关研究。也就是说,道德推脱不仅可以使员工更易于产生职场反生产行为、偏差行为等不道德行为,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员工的利他行为。对美国 384 名青少年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会反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Hardy et al., 2015)。对 600 名澳大利亚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同理心和道德认同通过道德推脱间接地与“没有伤害,没有犯规”(亲社会行为)的消费者道德维度负相关,犬儒主义通过道德推脱间接地与该维度正相关(Chowdhury et al., 2014)。对 550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王兴超、杨继平, 2013)。

对道德推脱影响道德行为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背景下进行的,且样本量较小,有一定局限性。此外,对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大都只研究道德推脱对亲社会行为总体的影响。但是,道德推脱有不同机制,亲社会行为也有其内在结构。因而在考察道德推脱对亲社会行为总体水平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不同道德推脱因素对不同维度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对“亲社会行为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以此探究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构成。通过对2000多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探讨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现状及其结构、道德推脱的程度、不同道德推脱因素对不同维度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进而阐述该研究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理论与假设

班杜拉(1986)提出,道德推脱通过八种不同认知机制产生作用。其中,前三种机制(道德合理化、委婉化表达、有利对比)有助于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认知重构看上去不那么有害;通过使行为看上去在一定程度上有益,这些机制产生了作用。道德合理化表明,有选择性地披露产品信息对维护公司的公共形象很重要;委婉化表达对有害行为重新命名,使其看上去是良性的;通过同更有害的行为进行对比,有利对比使问题行为看上去似乎无害。接下来的两种机制(责任转移、责任扩散)使个人在所导致的有害行为中的责任最小化。责任扩散机制倾向于将责任转移到组织而不是任何个人身上。这两种机制倾向于免除个人在道德代理中的责任(如“我是为我的老板做的”)。最后三种认知机制(结果曲解、责备归因、非人化)不是重新定义个人行为的影响,而是使那些行为的结果最小化、使有害行为对他人伤害的认知最小化。结果曲解通过将犯罪行为“无害化”而起作用。虽然非人化通常被认为是极端的,但它也会发生在平常环境下,特别是在官僚化、自动化和非个人的行为条件下(Bandura,1996)。

道德推脱是一种唤起道德推脱机制的个人倾向。上述所讨论的这些机制会促使个人重构他们的行为,使这些行为看上去无害,使个人在行为结果中的责任最小化;或细化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压力,使个人从自我制裁中脱离开来。因此当个人道德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为其反社会行为澄清时,他们从事反社会行为的阻力和失调也会越来越少。

班杜拉(2010)进一步提出,道德推脱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常人做了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根据这一理论,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建立了个人的道德行为标准。这些标准起着自我调节作用,从而使个人的行为通常与其内部的道德标准相符合,个人也会较多展现出符合道德标准的亲社会行为(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杨继平、王兴超,2012)。道德推脱在道德自我调节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有选择地失效,从而使个体的行为在违反其内部道德标准后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Bandura,2010)。寇彧、张庆鹏(2006)认为,亲社会行为泛指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群体的一切行为及行为趋向。从基本逻辑出发,在面对亲社会情境时,高道德推脱者会形成更多的借口为自己的不助人行为进行道德推脱,并进而表现出更少的符合道德规范的亲社会行为。

根据已有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越高,其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不同道德推脱因素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不同维度的亲社会行为。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广东、上海、浙江、广西、湖南、江苏、甘肃、福建8省市2000多名青少年(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问卷做了有效性别选,最终获得2000份有效问卷。抽样方法是混合抽样(方便抽样

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研究对象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面貌、不同类型学校的青少年。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①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亲社会行为。本研究所采用的“亲社会行为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其中“从不”计1分，“一次”计2分，“多于一次”计3分，“经常”计4分，“总是”计5分。得分越高，表明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具有丰富而广阔的内容，涵盖不同类型，因而亲社会行为的测评体系也应该是立体的(张庆鹏、寇彧，2011)。在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分析中，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其内部的结构特征。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道德推脱。利用班杜拉等(1996)编制的“道德推脱量表”测量道德推脱程度。量表共32个指标，包括8个成分(道德合理化、委婉化表达、有利比较、责任扩散、责任转移、结果曲解、责备归因、非人化)，每个成分有4个测量指标。研究量表采用李克特3点计分形式。其中“不同意”计1分，“有点同意”计2分，“同意”计3分。得分越高，表明道德推脱程度越高。量表信度良好， α 系数为0.883。

3. 控制变量

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因素较多。通过比较均值发现，青少年的基本背景信息影响亲社会行为。因此我们把学校类型、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所属民族、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社区所属类型这些基本信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统计分析模型当中。^②

(三)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软件、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控制青少年的基本背景信息(学校类型、性别、民族、来源地等)后，对青少年道德推脱总体水平与亲社会行为、道德推脱各因素与各维度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状况及其内部结构

从表1可以看出，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各指标的平均得分处于1.85到4.13之间。其中“在慈善机构做志愿工作”得分最低(1.85)；“为朋友保守秘密”得分最高(4.13)。这说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水平的内部差异较大。青少年较少从事慈善类亲社会行为；比较倾向于从事诚实守信类亲社会行为。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得分集中于3到4之间，高于理论中间值3分。这说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总体水平较高，且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性。

利用主成份分析，我们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5个因子。根据项目具体内容，我们对其分别命名为“情感体贴型”亲社会行为、“关系分享型”亲社会行为、“慈善利他型”亲社会行为、“诚实互惠型”亲社会行为、“生人援助型”亲社会行为。经检验，最后形成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整体的 α 系数为0.931。五个维度的 α 值分别为0.904(情感体贴型)、0.824(关系分享型)、0.742(诚实互惠型)、0.803(慈善利他型)、0.73(生人援助型)。

^① 由于篇幅原因，样本具体分布此处省略。

^② 由于篇幅原因，均值比较结果此处省略。

表 1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现状及其内部结构

	载荷值					
	公共因子					
	平均 得分	情感 体贴型	关系 分享型	慈善 利他型	诚实 互惠型	生人 援助型
给陌生人指路	3.1			.457		
给慈善机构捐钱	2.56			.749		
捐(给)钱给有需要的陌生人	2.73			.667		
捐东西或衣服给慈善机构	2.05			.812		
在慈善机构做志愿工作	1.85			.725		
帮陌生人拿东西	2.26					.788
借东西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邻居	2.34					.762
帮不熟悉的同学一块完成家庭作业	1.92					.628
调和同学之间的争吵	2.94	.405				
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用品	3.68		.742			
邀请旁观者一起参与游戏	3.25		.532			
伤害(或妨碍)他人后,主动道歉	3.75		.666			
和他人分享自己的零食或食物	3.8		.759			
体谅老师的感受	3.56		.486			
主动帮其他同学捡起掉落的东西	3.95		.64			
抓住机会称赞能力稍差点同学	3.12	.638				
对做错事的人表示同情	3.14	.574				
安慰一个正在哭或难过的伙伴	3.55	.57				
为生病的同学提供帮助	3.36	.621				
班上同学表现不错时会鼓掌或微笑	3.69	.574				
志愿清扫被其他人弄脏的地方	2.95	.693				
主动为老师提供帮助	3.01	.669				
为班上同学的获奖感到高兴	3.56	.639				
帮助他人避免陷入麻烦	3.28	.691				
花时间陪伴感觉孤单的朋友或伙伴	3.19	.642				
提醒同学上课不要讲话	3.12	.598				
跟玩得好的朋友互相倾吐心事	3.73				.448	
为朋友保守秘密	4.13				.777	
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	3.95				.704	
捡到东西后还给失主	3.62				.665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各维度亲社会行为的差异,我们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得分和平均分的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青少年各维度亲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平均得分	标准差	方差
情感体贴型亲社会行为	3.255	.629	.793
关系分享型亲社会行为	3.672	.573	.757
慈善利他型亲社会行为	2.457	.676	.822
诚实互惠型亲社会行为	3.859	.669	.818
生人援助型亲社会行为	2.171	.950	.975
亲社会行为	3.190	.409	.640

从表2可以看出,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总平均分为3.190,高于量表计分中间值3分。这说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水平处于良好状态。其中生人援助型(2.171)和慈善利他型(2.457)得分最低,低于量表计分中间值。这说明,青少年不愿意帮助陌生人;青少年自我意识较强,不愿从事慈善利他型的亲社会行为。诚实互惠型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最高(3.859)。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代青少年仍继承了这种传统美德。关系分享型的亲社会行为(3.672)和情感体贴型的亲社会行为(3.255)得分较高。这说明,当代青少年希望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

(二) 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道德推脱在各机制得分上的差异,我们对道德推脱各机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

表3 青少年道德推脱八种机制的得分

	平均得分	标准差	方差
道德合理化	1.506	.453	.205
委婉化表达	1.400	.388	.151
有利对比	1.171	.324	.105
责任扩散	1.871	.467	.218
责任转移	1.406	.388	.150
结果曲解	1.274	.361	.130
责备归因	1.392	.364	.132
非人化	1.258	.387	.150
道德推脱	1.393	.269	.072

从表3可以看出,青少年道德推脱的总平均分为1.393,小于量表计分的中间值1.5。因而从总体上看,青少年的道德水平比较理想,他们不倾向在做了不道德行为后对自身进行解释和开脱。责任扩散、道德合理化这2个维度得分大于量表计分中间值1.5,其中责任扩散得分为1.871,明显高于其它维度得分。这表明,青少年倾向将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归结于组织,从而减少个人对集体不

道德行为的责任。有利对比、非人化、结果曲解这三个维度得分较低,其中有利对比机制得分为1.171,明显低于其它维度。这表明,青少年不倾向将不道德的行为与更坏的行为进行对比,从而使其行为看上去可以接受。

(三) 青少年道德推脱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分析道德推脱各机制对青少年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6个模型内部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这说明,这6个模型中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每个模型的自变量都可以纳入回归模型进入分析。F检验表明这6个模型的结论具有推广意义。

模型1为道德推脱平均水平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出,道德推脱平均水平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道德推脱水平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降低0.148($p < 0.1$)。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王兴超、杨继平,2013);高道德推脱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Bandura et al., 1996)。这也证明本研究假设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在面对亲社会行为情境时,高道德推脱的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推脱机制为自己的不助人为乐行为找到合适借口,以免受良心谴责。

模型2为道德推脱各机制对情感体贴型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非人化机制对青少年情感体贴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非人化机制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倾向降低0.130($p < 0.1$)。也就是说,倾向对受害者非人性化进行道德推脱的青少年较少从事情感体贴型亲社会行为。

模型3为道德推脱各机制对关系分享型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非人化和责任转移机制对关系分享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非人化机制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降低0.117($p < 0.1$);责任转移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降低0.108($p < 0.1$)。责任扩散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责任扩散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179($p < 0.001$)。其他道德机制对关系分享型的亲社会行为影响不显著。

在模型4中,在控制了学校类型、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民族等背景因素后,责任扩散和结果曲解对慈善利他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其中责任扩散对慈善利他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责任扩散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减少0.128($p < 0.05$)。而结果曲解对慈善利他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结果曲解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130($p < 0.1$)。

从模型5来看,委婉化表达和责任转移对诚实互惠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委婉化表达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倾向减少0.160($p < 0.05$);责任转移机制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亲社会行为倾向减少0.139($p < 0.05$)。而责任扩散和道德合理化对诚实互惠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责任扩散得分每增加一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188($p < 0.001$);道德合理化每增加一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146($p < 0.05$)。

从模型6来看,有利对比和结果曲解对生人援助型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有利对比每增加一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264($p < 0.05$);结果曲解每增加一单位,亲社会行为增加0.238($p < 0.05$)。

从表4可以看出,责任扩散的道德推脱机制显著影响关系分享型、慈善利他型、诚实互惠型的亲社会行为;非人化的道德推脱机制对情感体贴型和关系分享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责任转移的道德推脱机制显著影响关系分享型和诚实互惠型的亲社会行为;结果曲解的道德推脱机制显著影响慈善利他型和生人援助型的亲社会行为;有利对比的道德推脱机制对生人援助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道德合理化的道德推脱机制对诚实互惠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委婉化表达的道德推脱机制显著影响诚实互惠型的亲社会行为。因而可以认为,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影响不同维度的亲社会行为。

表4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亲社会行为	情感体贴型	关系分享型	慈善利他型	诚实互惠型	生人援助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自变量						
道德推脱均分	-.148 [#] (.076)	—	—	—	—	—
道德合理化	—	.019 (.064)	.066 (.059)	-.066 (.064)	.146 [*] (.063)	-.099 (.078)
委婉表达	—	-.041 (.082)	-.056 (.076)	.028 (.083)	-.160 [#] (.082)	.018 (.100)
有利对比	—	.002 (.104)	-.094 (.097)	.144 (.104)	-.118 (.102)	.264 [*] (.126)
责任扩散	—	-.064 (.050)	.179 ^{***} (.046)	-.128 [*] (.050)	.188 ^{***} (.050)	-.033 (.061)
责任转移	—	-.023 (.072)	-.108 [#] (.067)	-.093 (.073)	-.139 [*] (.072)	-.027 (.089)
结果曲解	—	.050 (.089)	-.034 (.082)	.130 [#] (.089)	.004 (.088)	.238 [*] (.108)
非人化	—	-.130 [#] (.083)	-.117 [#] (.076)	-.023 (.083)	-.134 (.082)	-.026 (.100)
责备归因	—	-.010 (.080)	-.009 (.074)	.076 (.080)	.016 (.079)	-.048 (.097)
控制变量						
学校类型(1 = 重点学校)	.016 (.041)	.010 (.048)	.108 [*] (.045)	.095 [#] (.049)	-.040 (.048)	-.040 (.059)
性别(1 = 男)	-.011 (.037)	-.031 (.043)	-.057 (.040)	.078 [#] (.044)	-.176 ^{***} (.043)	.173 ^{**} (.053)
年级	.022 [#] (.011)	.031 [*] (.013)	.034 ^{**} (.012)	-.020 (.014)	.051 ^{***} (.013)	.009 (.016)
独生子女与否(1 = 是)	.042 (.041)	-.001 (.048)	.045 (.045)	.106 [*] (.041)	.017 (.048)	.060 (.059)
所属民族(1 = 汉)	-.060 (.067)	-.109 (.078)	-.027 (.071)	.118 (.078)	-.016 (.077)	.092 (.094)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1 = 是)	.192 ^{***} (.039)	.282 ^{***} (.045)	.205 ^{***} (.042)	.138 ^{**} (.046)	.164 ^{***} (.045)	.151 ^{**} (.056)
父母婚姻关系(1 = 和谐)	.230 ^{**} (.074)	.208 [*] (.085)	.085 (.080)	.116 (.088)	.204 [*] (.086)	.006 (.107)
来源地(1 = 城市)	.080 [#] (.042)	.070 (.048)	.046 (.044)	.195 ^{***} (.049)	.005 (.048)	-.046 (.059)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亲社会行为	情感体贴型	关系分享型	慈善利他型	诚实互惠型	生人援助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学习成绩 (1 = 中等及以上)	.183 ^{***} (.040)	.196 ^{***} (.047)	.142 ^{**} (.043)	.108 [*] (.047)	.067 (.047)	.145 [*] (.057)
模型其它值						
F 检验	9.314	6.021	7.301	6.422	6.265	2.868
调整后的 R ²	.062	0.059	.071	.062	.059	.022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各控制变量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也有影响,不同控制变量影响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父母婚姻关系、来源地、学习成绩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水平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其中,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水平和不同维度的亲社会行为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总体而言,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影响较为显著。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普遍较低,青少年较多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进行推脱。从道德推脱的各个机制来看,责任扩散、道德合理化得分较高;有利对比、非人化、结果曲解得分较低。青少年亲的社会行为得分高于理论中间值,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从亲社会行为的各个维度来看,诚实互惠型、关系分享型、情感体贴型的亲社会行为得分较高;慈善利他型和生人援助型的亲社会行为得分较低。这其中的可能原因在于,学校普遍重视综合素质教育。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青少年形成了良好的德行意识,责任感强,较少进行道德推脱,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此外,青少年(初中和高中)面对升学和高考的压力,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较少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

道德推脱的平均水平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道德推脱程度越高,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越低。道德推脱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有选择性地激活或失效,这种失效会使个体即使没有按照道德规则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也不会产生强烈的内疚和自责(王海英, 2015)。这种道德的自我调解机制可以从意识上修正主体的道德认知,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影响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当个体的社会行为同社会的道德标准发生冲突时,这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道德推脱)就成为决定亲社会行为进行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会促使个体行为摆脱按照其自身道德准则而行事的思维方式。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减少自己的行为责任等方法,道德推脱这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会导致道德自我调节失效,降低个体对不良行为所导致的伤害及这些不良行为在后果中的责任的认知,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愧疚感和罪责感(王海英, 2015)。加强青少年的德育工作、提高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推理水平会进一步促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针对当代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状况,采取适当的干预方法非常有必要。

就国内目前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来说,不论测量还是相关研究,都还没有发展出亲社会行为

的具体操作化指标。综合国内外有关文献,本研究制定出适合中国背景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对量表的具体指标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探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差异。这对有关我国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分析道德推脱各机制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阐明道德推脱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这对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意识、进一步提高其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证明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可以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意识,进而提高其亲社会行为的水平。针对研究结果,采取提高青少年道德认知的措施,这对促进多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也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推脱是受个人所在社会情景影响和随社会长期发展而变化的认知倾向。班杜拉(1986)认为,道德推脱明显是相互作用的,是个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有义务对个人的道德推脱水平进行干预。根据社会化理论,青少年处于预期社会化阶段,是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学校、家庭是青年社会化的主体,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减少道德推脱倾向,促进亲社会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条相关建议,包括加强舆论的导向作用、创建和谐的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等等。

首先要加强舆论的导向作用。近年来,校园暴力行为、青少年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具有很大影响。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众广泛,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化因素。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不健康的、反社会的内容会对青少年的道德社会化产生不利影响。因而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以阻止大众传媒中不良信息的传播;同时,要加强示范和导向作用,在主要媒体上积极推进精品工程,提升媒体形象定位,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作品来唤起青少年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从而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体道德社会化的积极引导作用。

其次要创建和谐的校园环境。本研究表明,高年级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低年级青少年,年级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学校教育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因而学校应加强学生的道德心理教育。一方面,要增设相关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另一方面,应创建积极的校园环境(比如,张贴一些有关道德的名言警句,以班会、演讲比赛、专题讲座等形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等)。一个班级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会对每个成员产生影响,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于一致。老师应创建积极向上的班级环境和良好的师生关系,使青少年从积极的氛围中感受到和谐的快乐,从而将正确的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再次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未成年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养、模仿、感化、熏陶)。父母应向青少年灌输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引导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应以身作则,践行正确的道德行为,为孩子树立榜样。积极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道德情感,从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这可能会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应尝试和其他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法)相结合。其次,虽然我们假设道德推脱可以预测亲社会行为,但是相反顺序也可能成立,亲社会行为反过来可能也会影响道德推脱方式。未来研究应该采用实验和纵向设计,以使我们更好推断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些潜在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质没有纳入模型。比如,个人社会取向的不同会影响他们从事合理化行为时的机会主义程度,也会影响他们对不公平对待的敏感程度;移情和道德认同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等等。

参考文献:

- 寇戎、张庆鹏 2005,《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王海英 2015,《高中生道德推脱和亲社会行为的典型相关分析》,《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

- 术年会摘要集》。
- 王兴超、杨继平 2013,《道德推脱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心理科学》第4期。
- 杨继平、王兴超 2012,《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心理学报》第8期。
- 杨继平、王兴超、高玲 2015,《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期。
- 张庆鹏、寇斌 2011,《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测评维度的建立与验证》,《社会学研究》第4期。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2010, “Selective Activation and Disengagement of Moral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1).
- Bandura, A. et al.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 Baron, Robert A., H. Zhao & Q. Miao 2015, “Personal Motive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Decisions by Entrepreneurs: Cognitive Mechanisms on the ‘Slippery Slop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8(1).
- Chowdhury, Rafi M. M. I. et al. 2014, “The Relationships of Empathy, Moral Identity and Cynicism with Consumers’ Ethical Belief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4(4).
- Fida, Roberta et al. 2015,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The Roles of Stressors, Negative Emotion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0(1).
- Hardy, S. A. et al. 2015, “Moral Identity and Adolescent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Interactions with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4(8).
- Osofsky, Michael J. et al. 2005,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cution Proces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9(4).
- Paciello, M. et al. 2017, “Personal Valu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romote Aggressive and Rule-breaking Behaviours in Adolescents with Disruptive Behaviour Disorders: A Pilot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1(1).
- Pelton, Jennifer et al. 2004,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Extension with an American Minority Samp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6(1).
- Teesson, Maree 201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Resistive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and Alcohol and Cannabis 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Sydney, Australia.”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20(3).
- Tsai, J. J. et al. 2014, “Locus of Control,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port, and Rule Transgression of Athlet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2(1).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兵

Column on the Study of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ning for Youth Development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romot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Li Ding*(1)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is a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How the country recognize and adjust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organizations , whether empowe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cooperation or contradict and conflict with them , all these would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fixation of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 which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n this basis , we further show the role of mass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untry management simultaneously , we must liberate the thought , 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 , set up reasonable system framework ,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space and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 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governance of folk soci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Student Associa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The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 *Liu Shan & Shi Renbing* (17)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0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Hunan , Guangdong , Guangxi , Shanghai , Gansu , Zhejiang , Fujian and Jiangsu ,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 the condi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structure ,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on the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 for the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s relatively low , the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is relatively high. According to the further analysis , we could find that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reversely predict the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significantly , name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s , the lower the adolescents'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is. For the adolescents ,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influence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Keywords: Moral Disengagement Prosocial Behavior Adolescents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dolescents' Migration Status and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Bond

..... *Hong Pei & Gao Yunjiao*(27)

Abstract: The migrant adolescents' crime is the main bod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t is also a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the study of